

# 政府视野下公共文化治理的三重使命\*

□ 颜玉凡 叶南客

**内容提要** 科学的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的构建,要求政府围绕文化治理行动在不同层面的使命来进行系统设计。在国家转型层面,面对社会思想危机,公共文化治理需要在新时代语境下复苏公共意识以强化社会凝聚力;在公众生活层面,文化治理思维的生活转向使国家期冀通过治理行动来充分发挥公共文化对群众生活的引导功能,对社会文化生活进行矫治;在文化供给层面,政府必须重视文化产业的社会控制功能,对文化市场进行整治,通过多元主体共治来维护文化产业的公共精神价值坚持。公共文化治理在三个层面的使命及其实现途径相辅相成,犹如三架马车,共同驱动着公共文化的时代担当。

**关键词** 政府 公共文化 治理 使命

作者颜玉凡,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生、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叶南客,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河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4)

DOI:10.14167/j.zjss.2016.03.016

## 引言

当下中国的利益格局面临着深刻调整,计划经济时代大一统的一元化利益结构已然瓦解,斑驳在社会利益关系中的社会结构分层已清晰可见,每个阶层都在试图用属于本阶层的文化符号来彰显自身的阶层意识和阶层性格。因此,在这个看似变动不居的多元的、细碎的个体化时代,我们总能摸索到一个深深嵌入在消费倾向、娱乐方式和交往模式中的多样化的阶层文化形态。相伴而生的各阶层间文化区隔的逐步加深,以及部分领域中文化冲突的加剧,使得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盘根错节,不断呈现出复杂性、结构性和制度性特征,社会结构存在严重分裂的危险。面对这种深刻的社会危机,政府开始尝试重建赋予时代内涵的公共文化来对转型期的文化区隔

和文化冲突进行强有力的调节与控制(即文化治理),确保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但是,“文化的传统治理模式中那些对政治神秘主义和文化隐喻主义的过分依赖在公开化和透明化时代都将被消解”<sup>①</sup>,原有的由政府强势主导的全能全控的行政管理模式业已呈现出效应递减趋势,这种体制性衰退进一步引起了“决策权威和行政执行力的系统性危机”,政府如果仍旧依赖运用功能切割、类别隔离以及工具控制等管理方式来对公共文化建设进行类型化与模式化操作,则会使公共文化对公众意识形态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这项重要功能被削弱。故而,现代公共文化建设亟需治理理念的重塑和治理结构的调整。

然而,行动往往是嵌入性的,公共文化总是发生在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社会发展情境中,它是一系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制

\* 本文是2015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江苏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5ZHB002)的阶段研究成果。

度于文化发展场域中编织的一套复杂治理结构。在此背景下,只有明确公共文化治理肩负的各项使命,才能围绕这些使命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对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展开系统设计,公共文化建设的行动方向才会更加明确,政府的行动策略也才会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遵循此项认知,政府在这个文化激荡的时代洪流中期冀公共文化治理于社会系统的不同领域所承担的多重使命,便成为本文探求的核心要旨。

### 一、公共文化治理在国家转型层面的使命: 新时代语境下的公共意识复苏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是由国家支配的单位再分配体制所塑造的,但是随着中国的国家转型,国家权力控制在许多领域逐步下放,政府职能持续外溢,全能型国家控制模式逐步弱化,单位制度中由传统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维系的一致性社会随着单位的解体而走向终结,进行公共意识形态输送的社会基础出现缺失,迫切需要重建传播公共意识的有效载体。

1. 国家转型期的深刻危机:公共意识形态的良性延续面临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意识形态是依托单位制社会来灌输的。单位制“被看作是一种制度,是因为它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和机构形态”<sup>②</sup>,个人的生产和生活全部依存于由政府打造的单位制社会中,它为国家搭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导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国家通过对资源的全面控制,借助个人对于单位的全面依赖,在单位空间中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纵向的“国家——单位——个人”社会结构中,个人的工资福利、社会地位、职业身份、政治发展等几乎所有的生存资源都来自于单位。个人与单位之间建立了一种建立在稀缺资源再分配基础上的组织性依附关系。借助这种全方位的组织性依附关系,政府得以在单位空间中贯彻并全面展开能够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并通过宣传话语象征、公共空间营造、文化活动的组织和社会主义群众动员等策略,在单位空间中不断生产着公共物质生活和公共精神生活,人们对于政府权威的认可和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体认同也由此

产生,国家也在单位空间中由政治共同体逐步演绎成社会意识的共同体。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倾力构建一套以终身就业为支点的,由所属单位直接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社会政策体系,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非常稳固。国家力争在这套体系中做到使所有个体都享有就业保障,单位里的个人及其家属的医疗、住房、教育和养老都能得到社会保护(单位保护)。在这个迷你型福利国家(各个单位)里,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完美凸显。城市中的单位福利制度以及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农村公社)的集体福利制度使中国实现了收入分配的平等,“它向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边和街路上并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sup>③</sup>在那个物质财富极为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通过对个人生老病死的社会性保障使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终极价值信仰和社会最高理想由人们的自发选择而融入到每个个体的价值信念之中,公众对于自我生存状况的认同使得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赞同变得异常稳固。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社会政策的转型,国家逐步从一部分社会福利领域中有计划地退出,个人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分配制度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化趋势,部分社会福利功能转由社区承担,个体对单位的组织性依附关系随之解体。于是,个人在单位福利制度崩塌之后对社会产生了不信任感,一部分群众只专注于追求自我物质生活满足而忽视精神生活,凡此种种,都使以前的计划社会中所拥有的集体认同不可避免的走向消解,原初的那种崇高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信仰亦随之衰落。而且,资源的自由流动使得个人可以对其命运进行自我主宰和控制。随着传统权威秩序的松动、旧有观念中确定性生命意义的瓦解和原有人生价值系统的崩塌,个人那些与实践知识、原始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也随即丧失,他们不得不独立面对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的风险。泛化在社会中的是以私性道德为基础的私人信任,社会关系越来越陷入工具化和碎片化的危境,原有的充满温情和集体意识的共同体纷纷走向解体,生活之惯常习

性随之崩塌。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崇尚个性、关注私性生活的城市中产阶层迅速崛起,中产阶层文化侵蚀了工人和农民阶层的一部分文化话语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个体化意识的无序蔓延。于此社会主义与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之间激烈碰撞的社会危机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群众中的吸引力与约束力面临着严重威胁,在社会转型的种种流弊中重新唤醒公众的集体主义公共意识困难重重,我国文化领域的价值导向亟需治理。

2. 诊治社会思想危机的天然良方: 发掘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

葛兰西在传统的文化管理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通过文化来进行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他认为文化不再是社会管理者主观强加于被动对象的具有明确统治内涵的表意性机器,亦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自上而下的强制灌输。相反,所谓“文化治理”被演绎成社会管理者、社会各阶层之间互相协商的结果,是一个同时包含着抵抗和收编的过程。他指出文化是一种经过装饰的强大软性力量,“渐渐取代其刚性的内容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直接的暴力支配而转变为一种间接地支配,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服从或依随一种教导或言说”<sup>④</sup>。蕴含着意识形态熏陶的文化价值共识(文化认同)犹如“社会水泥”,保持着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统一。也就是说,社会管理者不会再将一套机械的协调一致的价值观念强加给整个社会(这样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而往往用异彩纷呈的文化宣传方式来描绘世界,在此过程中想方设法将其倡导的利益展示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利益,并通过适当的让步和妥协将各阶层的不同思想成功地整合起来,从而将社会各阶层之间复杂的、相互冲突的文化意识弱化成单纯的表面形式差异,逐渐消除阶层之间的对抗态度,将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从思想上根本消弭掉,解除社会思想危机。在此基础上,文化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手段。

在现代化浪潮和全面体制改革的双重作用下,公共精神和集体认同在个体的精神生活中逐渐式微,一些人的心灵世界被单一的私性生活所充斥而变得孤僻与不合群,于是,他们在公共信仰的沦丧中变得空虚和茫然无措,整个社会集体也

因公共精神的衰落而面临人心涣散的危机。如何借助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来重拾社会的普世价值,重建社会信任,形塑承载个人生活的健康价值观和理性期望的集体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的重要诉求。

3. 公共文化治理的社会凝聚使命: 形塑承载健康价值观的现代集体公共意识

公共文化是文化中具有公共性的那部分,大致包括公共哲学、公共规范、公共形象和公共精神等内容,具有群众性、共享性、内聚性、包容性和时代性等特点<sup>⑤</sup>,其与大众文化中的经营文化相对,它不以营利为目的,带有鲜明的国家价值取向,代表了国家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国家倡导的文化发展方向。

阿伦特相信存在一个纯粹的公共文化领域,它“是公民可以通过言论和行动显示自我的高度显见的场域,它展现的是一种非自然的、人为性的、以价值共识定位的理想公民共同体”。<sup>⑥</sup>也就是说,公共文化可以通过对个人价值观念的渗透与潜移默化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调控,并依靠这套调控机制来调节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而将社会成员的个人目标与社会整体目标有机统一起来。同时,公共文化还可以通过引导群众心理对群众文化生活起到引领作用。通过公共文化培养起来的共同核心价值观念会不易察觉地左右群众的心理认知,使他们将其文化生活置于群体意识、公共观念和共同文化价值观念的规约之下。在此思路指导下,国家所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实践旨在形构一个不受个人意志支配但对社会成员具有很大制约作用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方面,它在政府主导下以实现公众文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认可为主要政治目标,力图在文化建设中向群众有效灌输国家制度所推崇的文化价值观;另一方面,它通过让社会成员参与一系列公共性文化活动,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在思维方式、审美取向、道德规范、行为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达成较为一致的文化共识,从而使社会成员对这种文化环境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sup>⑦</sup>,增强社会的文化凝聚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下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时代语境和文化发展不断自下而上的实践转向过程中,公共文化并不是盲目的强制公民个体的文

化意识对其绝对无条件服从,它以尊重社会成员个性化的文化需求、品位和创造力为准则,并不会淹没每个社会成员的文化个性,“它尊重个人意愿,承认个人利益,发挥个人才能,给予个人充分自由和选择余地”,<sup>⑧</sup>因此,这种新型公共文化对群众文化生活的引领作用既不会使其成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群众文化,在它指导下的群众文化生活始终会以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作为其自我维系的灵魂和发展动力,但它又会为社会成员留有充分的个体自由,进而使社会成员在保持自我的文化生活中进一步增强群体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

进一步说,对公共文化的有效治理一定是围绕着在社会中重塑科学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系统治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一味的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关怀层面的孤芳自赏型意识形态观,更不应被消费成一个政府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空洞口号。这要求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时,既要坚持多元主体参与,又要坚持和贯彻党和政府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通过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各项艺术智性活动,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一般大众的精神品质和行为品性中,进而将赋有时代内涵的公共意识重建起来。

## 二、公共文化治理在公众生活层面的使命: 引导和规范群众的公共文化生活

只有贴近百姓生活的东西才能深入人心。在迅猛的现代化浪潮中,原先计划经济时代所依托那套依靠价值观念单向灌输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僵化教育为主要手段的主流意识形态灌输模式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我国的文化阵地建设因缺乏对群众生活的真切关注而存在一定的价值缺位现象,这为盲目追星、黄赌毒、酗酒网瘾、封建迷信邪教活动等粗鄙、媚俗的不良文化的蔓延提供了温床,动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部分群众的内心中的地位,对社会健康发展造成了威胁,群众文化生活亟需治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机制亟需创新。

1. 文化治理思维的现代性转向:关注大众的文化生活实际

在传统概念中,因文化始终受到经济发展、地理环境、政治制度和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其被

限定在社会关系结构的再生产中,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配角和依附性变量。这种思想认为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为大多数人建构着一种社会现实感和不可或缺的绝对意义,它是那种被每个个体所实际体验到的,被特定人群所主导或从属的蕴含鲜明价值取向的有形文明与无形文明的综合体。基于此种认知,传统的文化思想多聚焦于“精英精神”所倡导的主流文化取向。与此对应,文化概念亦被操作成被社会精英设计和认可的“绝大多数人所共享的态度、价值观和信仰”<sup>⑨</sup>。这种观点更多强调主流文化的领导地位,关注社会管理者如何有效地对公众实施灌输性质的文化绝对支配,致力于探讨如何构建整齐划一、顺序连贯、充满规律性的社会公共文化。故而,在对文化整合、文化适应和精英文化的持续关注中,公共文化被建构一种遍及全社会的无差别的一致性规范。这种仅着眼于整体性的宏观思维方式,往往将不同区域的地方性意识差别和不同阶层的大众文化取向差异简单的压缩成“平均值”,使其逐渐被异化为理想的精英社会中具有同质性的标准化零部件,从而使对文化形态的解读因刻意掩盖多样性而强调所谓“主流”,公共文化被片面的曲解为面目单一的木偶。

然而,在阶层文化区隔日益明显的今天,原先的精英文化理论已越来越背离各国文化发展的实际。于是,英国学者本尼特从公众日常生活方式所蕴含的价值意义这一基本维度提出了文化治理概念。他认为尽管文化治理因其关联着政府的政策,表面上与文化的民主性质完全相对,但文化政策仍应被视为文化治理的一部分,“文化始终是一门改革者的科学”<sup>⑩</sup>。而且,文化从来都包含一种标准化机制,它“总是同时站在规范性划分的两边”,力图“跨越由这种划分所创生的对立领域”<sup>⑪</sup>。这种机制会创生出一个斜度(a normative gradient),用以具体指明文化改革的推动力所必须遵循的社会生活发展方向。文化并不是以自身名义存在的、不受控制的实体,也不仅仅是只有通过认知的形式才能把握的一种价值意义。相反,因文化自身所包含的多样性框架、习俗和程序等特征,使其具有生活实践性,即“文化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只是描述现实,它还构造现实”<sup>⑫</sup>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文化建设应持续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为大多数人

构建一种现实感,并内化至每个人的生活中,使人们感到一旦超出这种“经验现实,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在其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内便难以行动”<sup>③</sup>。因此,如果不对能够改革生活方式的文化资源进行管理和治理,现代社会梦寐以求的各阶层之间的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也就无法实现。基于此种认知,本尼特从一开始就倡导将文化治理概念与那些“既重视不可避免进入到文化领域机构中的管理成分、又强调伴随它而来的改革规划的文化观念”<sup>④</sup>结合起来,将文化看作是历史进程中一系列特定相关制度所形成的用于规范社会生活的特定治理关系,而文化治理也就自然成为日益治理化的现代化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一项致力于使文化风潮回归对公众文化生活深远意义的真诚关注的行动实践。

2. 巩固执政根基、确保社会和谐的有力手段:通过治理来充分发挥公共文化的生活引导功能

在文化治理思维的生活转向影响下,政府更加重视发挥公共文化对群众生活的导向功能,力图将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理念包裹和融入进贴近大众生活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中提供给群众以进行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使群众沉浸在国家所推崇的生活方式中潜移默化的接受和认可社会主义价值观,这是政府着眼于群众生活而采取的新型文化策略。

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项广泛吸收群众参与、由大众所共享的活动,它以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质量为根本依归,为人们塑造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在体现党和政府关心人民文化生活的品质的普世人文情怀的同时,借助提供符合老百姓日常生活需求的文化服务来使群众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是,这种以政府引导、群众动员为基础的公共文化社区参与使群众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在其个体文化生活中的存在感和重要性,从而巩固了执政根基。另一方面,当下中国文化样态的阶层化与多元性共存,使得公共文化建设必须以重视微观行动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尊重多样化文化生活为前提,通过治理个体及其所属阶层的生活方式来调适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各阶层融洽相处,实现社会和谐。

3. 公共文化治理的社会矫治使命:致力于通

过多种途径规范社会文化生活的全面治理

在上述理论指导下,国家治理体系针对群众生活所展开的公共文化治理行动,要求通过完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来对群众文化生活进行引导与矫治,通过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健康文明、贴近生活、注重品位的公共文化活来引导居民的生活取向,提高居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等素质,并借助新兴媒体及时发布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占领舆论和文化阵地,通过健康的舆论和文化导向,有效抵制腐朽落后的文化、思想和陋习对群众生活的侵蚀,使每个个体的文化价值观念都在生活中按照国家意志来形塑,从而促进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

然而,通过公共文化治理来规范和引导群众文化生活又是一个具有多重维度的复杂进程,公共文化必须摆脱传统精英文化体制单纯依靠精英文化来主导社会文化的形成、发展、繁衍与创新,对各局部群体的文化传统在个体文化生活中的集聚力、穿透力和感染力视而不见的弊端。各局部群体的文化往往是一种独特的合成文化,这些不成文的文化传统和仪式往往会与公共文化一起作为中介衔接着国家的社会管理与群众的日常生活,它会通过对群体内部社会关系、思想行为和主体意识进行规范,来发挥维护群体利益的社会管理效应。认识到这点,就需要对群体文化和公共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治理,确保群体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与公共文化所倡导的一致,以使其与公共文化相辅相成,共同缔造健康的群众文化生活。

### 三、公共文化治理在文化供给层面的使命: 文化产品的公共价值回归

公众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生活,需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文化产品来充实。但是,转型社会中文化生产的计划体制残余和市场畸形发展,导致文化产业所应秉持的政治信仰和文化尊崇逐步衰微,偏离了文化改革的原初理想,文化产品要么因抽离精神内核而媚俗,要么因与生活脱节而无法撼动心灵,缺乏有力价值引导的文化产业成为使群众沉溺于物质生活而远离高尚文化生活的推手。同时,片面追逐利润而

忽视社会公共价值的文化生产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阶层间文化权利的不平等程度,成为加深社会隔阂的帮凶。文化产业亟需通过治理来实现价值回归。

1. 文化产业的社会控制功能: 话语阶层进行文化渗透的物质载体

文化产品蕴含着某种既定的操纵性理念,且与生而来具有某种标准化倾向,但囿于文化产品所具备的难以抵挡的诱惑性,以消费娱乐和商品交易为目标的文化生产还是可以“通过激发精神上或情感上的反应将‘心甘情愿的’消费者和文化的生产者绑定在一起”<sup>⑤</sup>,进而将所有文化服务对象都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中。由此,文化工业会作为一种难以察觉的强力行动结构作用于每个文化生产组织,并逻辑一致地延伸至个体行动者的潜意识中,进而诱导个体行动者按照文化产品所要灌输的主导意识来开展文化实践。从这个角度上说,文化工业可以有效抑制人们内心中那些具有破坏性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规范独立个体的自我判断和产生反叛意识的冲动,培养社会所期望的那种具备纪律性和一致性“美德”的单向度个人。

于是,在社会阶层化的现实情境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掌握话语权的社会阶层会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来表征其文化实践,将本阶层需要的话语编码入文化媒介中传递给解码者(即文化受众),以维护和扩大该阶层的社会影响力。然而,由于编码与解码的不对称性,文化受众并不一定会按照编码者的本意来解读意义,反而经常会依据自己的身处情境和社会地位来分享意义。这促使文化产业重拾几被遗落在光彩夺目的文化产品之后的文化工业批判逻辑,将那些具备批判性、创造性的文化受众认真纳入到文化生产体系中,增进文化产业与文化受众之间的彼此了解,进而提高文化产品的思想穿透力。

2. 文化产业公共价值缺失的不良后果: 健康公共生活的远离与文化权利不平等的加剧

随着文化产业私有化的扩张和新兴数字媒体的快速崛起,一些文化生产并未按照国家倡导的公共价值精神来进行规范,甚至被一些有害话语所渗透,国家意志在一部分文化领域中的话语权存在被削弱的危险,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共

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引导力和掌控力。

首先,文化市场缺乏价值引导的失控发展导致群众沉溺于低级的经济生活而日益脱离高尚的公共文化生活。文化产业中经济维度的无序扩张导致其对公共政治领域的非法侵占,并使公共领域发生恶质蜕变,推行文化民主化的政府政策和公共文化服务因为需要无奈地面对商业逻辑的残酷检验而举步维艰。而且,经济话语对公共文化空间的粗暴侵占,也促使包括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大面积非政治化,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许多人处心积虑的追逐物质生活所关切的资源,对那些更大的、自我之外的问题和事务的封闭和漠然拉开了人们与公共文化生活的距离。

再次,文化产业对公共领域的冷落,加深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隔阂,使文化权利阶层不平等现象加剧。完全市场化并不能提供确保公民享有平等的文化权益所必需的广泛文化资源,文化市场无序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文化供给多样性和文化权益实现路径平等性的湮灭。在阶层文化区隔日益明显的当下,弱势群体在文化资本上的缺失使得其在文化权利的享有上也处于弱势地位,文化产业的无序发展必然导致文化享有上的不公正。文化产业在自由市场体制下的逐利本性使其文化产品生产仅针对那些有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的人群,城市特困人群、新生代农民工和落后农村居民等社会边缘群体的文化权利却往往无法通过市场来满足,而且市场中的文化产品档次也会因不同群体的消费水平而异,高档次的文化产品因其相对高昂的价格自然会排斥中低收入群体,这就使社会群体在文化产品占有上被自然区隔开来,并且每个群体因其特有的文化消费取向而显得越来越封闭,于是,私性文化愈加盛行,公共文化日益衰微,阶层隔阂导致的社会鸿沟难以弥合。

显见,从提升服务品质和效率角度出发,公共文化服务不能回到完全由政府计划来配置文化资源和提供服务的老路,需要吸引文化产业参与进来以提高公共文化发展的活力。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质又决定了不能将其完全托付于追逐利润的市场机制。如何使公共文化服务既摆脱传统行政惯习的僵化束缚,又使其脱离传统的市场价格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种真正享有文化资

源与集体参与的非剥削空间,并立足于坚持文化权利人人平等原则重构文化产业的自由生产与国家意志的坚定贯彻之间的关系,是公共文化建设面临的严峻课题。

3. 公共文化治理的市场整治使命:维护一个秉持公共精神的文化产业

文化领域的公共价值失落全面弱化了国家在文化领域的社会控制能力,缺乏公共精神内核的文化产品不能承载培育健康公共文化生活的功能。公共文化服务正是我国在文化产业发展多元化走向愈发鲜明的情势下实践的一项基本文化制度,为提高这项服务的发展活力,需要文化产业的大力参与,但其致力于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平等的理念始终如一。在此情境中,基于公共领域的重建来对文化产业发展方向进行引导显得颇为关键,尤其要使文化产业能够积极投入公共文化建设,不仅需要给予文化单位相应的利益回报,更要唤醒它们履行其社会公益责任的自觉意识。于是,政府在众望所归中理应承担起促进文化企业社会责任回归的主导责任,它需要为文化产业秉持公共精神提供强有力的价值引导、制度规范和资源支撑。

呼唤文化生产领域的政府回归,并非固执地为意识形态形塑全部国家面貌的计划经济时代招魂,更非简单地堕入依赖精英文化进行治理的狭隘思路。公共文化治理在文化供给领域的整治行动要求政府在规范文化企业的生产以遏制媚俗文化产品泛滥的同时,将群众评价纳入到文化工作绩效评价中以激发文化单位开发贴近群众生活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内在动力,并引导文化产业秉持以文化权利平等作为基本原则的公共精神,来重新关注公共文化生产在消弭阶层间文化隔阂方面所应承载的历史责任。

为了实现上述使命,公共文化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变革需要通过政府的有效治理活动、社会组织的有效调解活动、人民大众的有效参与活动和文化单位的有效生产活动之间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良性运行。这就要求政府从直接生产者的角色中部分退出,在文化服务中融入市场化发展理念和系统治理理论,以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民主科学的新型文化事业单位管理机制、公共

文化的群众自主参与机制为纽带,实现多元主体对公共文化的合作共治。

## 结 论

总之,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需要通过公共文化治理来形塑赋有时代内涵的集体公共意识以凝聚人心,这就需要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到蕴含国家意志的公共文化生活中来。故而,公共文化治理必须关注公众的生活实际,通过提供蕴含健康价值观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来规范和引导群众的公共文化生活。然而,为提升公共文化生活的品质与活力,在文化供给中吸引文化产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非常必要。因此,公共文化治理需要整治文化市场以促进公共价值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回归,为健康的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提供保障,这在客观上要求多元主体对公共文化生产进行合作共治。在上述思路指引下,公共文化治理的三重使命及其实现途径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逻辑紧密的体系,其与国家力量在一系列文化生活和生产领域的部分退出、重构和强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纵横交错却有趣至极的人文图景。

由此,公共文化治理在国家意识形态意义上于不同层面所践行的艰巨使命便清晰呈现出来。在国家转型层面,通过发掘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来应对公共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良性延续危机,建构了公共文化治理诉诸基于文化认同来实现社会凝聚的价值基础和现实可能性,深入到群众中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吸引群众广泛参与也就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题中之义和理性憧憬。在公众生活层面,文化治理思维的现代性转向和巩固执政根基、维护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促使公共文化治理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来规范社会文化生活,消融阶层间的文化隔阂。最后,在文化供给层面,经济转型中文化产业在片面追求利润逻辑下的公共价值缺失,呼吁国家重视失控的文化生产破坏国家话语真实意涵的危险,对远离健康公共生活与文化权利不平等等不良现象加以遏制,因此,公共文化领域需要通过有效的治理活动,在政府引导与规范下实现多元合作,维护一个秉持公共精神的文化产业,完成公共文化治理中“依经济学的模式运用权力的艺术”<sup>⑥</sup>的转型。

(下转第127页)

阶级利益,也能够得出与后资本主义道德评价同样的结论。

他们之所以在资本主义是否正义的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失误,以至于误解了马克思及其正义思想,其共同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的共同理论范式。在面对以罗尔斯和诺齐克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正义论强势崛起的现实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甘示弱,在激进的左派语言中重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形成激进左派。激进左派之所以被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是以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作为其哲学分析方法,且围绕着分析方法逐渐形成了“分析的”理论范式。“分析的”理论范式在注重“论证严密和概念明晰”<sup>②</sup>的同时,也就在强调细节和拘泥于字词句等细枝末节的具体事实之际渐行渐远于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视域,缺失了总体性历史视角,无法在总体性历史中求解,也就难以找寻到能够统摄历史总体的根本正义标准,自然而然地也就在资本主义是否正义的问题上误解了马克思及其正义思想。

#### 注释:

①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8页。

② 罗伯特·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论》,高岸起译,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995~997、379、927、927~928页。

⑳ 艾伦·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载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7、29、33页。

㉑⑫⑬ 艾伦·伍德:《马克思论权利和正义:对胡萨米的回复》,载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8、84~103、89~105页。

㉒⑭⑮ 齐雅德·胡萨米:《马克思论分配正义》,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75、60、70页。

㉓⑯⑰ 德雷克·艾伦:《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的分配正义》,载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38页。

㉔⑱⑲⑳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226、338、619页。

㉕⑳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页。

㉖㉑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郭大力译,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67页。

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罗伯特·韦尔:《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被分析的》,载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责任编辑 俞伯灵

(上接第95页)

#### 注释:

① 王列生:《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意识形态前置》,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2期。

② 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③ 沙健孙:《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9期。

④ 赵旭东:《人类学与文化转型——对分离技术的逃避与“在一起”哲学的回归》,《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⑤ 王立明:《公共文化的功能及其建设途径》,《企业家天地》2006年第6期。

⑥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骥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7页。

⑦ 周怡:《文化社会学的转向:分层世界的另一种语

境》,《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

⑧ 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强东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徐一超:《“文化治理”:文化研究的“新”视域》,《文化艺术研究》2014年第3期。

㉑⑳ 约翰·斯道雷:《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学术月刊》2005年第9期。

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雷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强东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London: Sphere, 1968, pp.26~27。

责任编辑 俞伯灵

hancing prevention awareness, utilizing adequately technology of improving privacy protection, and transferring the direction of regulations. In this case, the aim of privacy self-management is able to achieve.

**Key words:** internet age; privacy self-management; privacy prote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ifferent Value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Group of You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74)

Li Qingzhen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Youth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groups, whose behavior and values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era.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is accompanied by new media to grow up, a group of people, they not only grow in Chin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a substantial material base, and live in the TV, Internet, instant 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modern mass media rapid development era. Therefore, this group of people has a unique value and way of thinking. This article plans through 60', 70', 80' and 90' four generations of youth culture theme and the pursuit of individual value comparison to analyze the contemporary youth -- 80, 90, after the thought, behavior and value pursuit of the particular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network as the embedded factors affects the change of the values of each generation of Internet users and the change of life style. If we regard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the macro background factors of the chang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s values, then, the network i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changes in the value of the intervening factors.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 because it directly changes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of people.

**Key words:** Social Change; Values of Youth;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Cognition Mechanism and Rational Restriction of Legal Decision** (82)

Li A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Making a legal decision is viewed as a unique cognitive process. It can be found that intuition mechanism is as important as the rational analysis in legal decision when the discovery and justification of legal process is analyzed by cognitive science. Without the previous inspiration of intuition mechanism, there will be no foundation for rational analysis. And without the rational processing analysis, it is hard to restrict the intuition, which will make the legal decision the judge's self-admiration. The true case may be like this: intuition mechanism provides a possible answer for an individual legal case, and the rational analysis facilitates this answer to be a convincing legal decision which would be accepted by the public.

**Key words:** legal decision; intuition; rational; legal cognition

**The Triple Missions of Public Culture Governance in the View of Government** (89)

Yan Yufan<sup>1</sup>, Ye Nanke<sup>2</sup>

(1. *Depart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2. *Nan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98*)

**Abstract:** Establishing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public culture governance needs the government's systematic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culture governance actions' missions in the various levels. On the aspect of the state transition, facing the crisis of social ideology, the public culture governance needs to rebuild public consciousness for strengthening social cohesion in the new times. On the aspect of the citizens' lives, the culture governance thought's transformation to people life, makes the state hope realize adequately the public culture's guiding function to citizens' lives by the governance actions, and correct the social cultural life. On the aspect of the culture supply, government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cultural industries' social control function and the regulation to the culture market, and maintain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values of

public spirit by Multi-Subjects' cooperative governance. The triple missions of public culture governance and their realization approa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linking three carriages, drive the public culture's responsibility in current era together.

**Key words:** government; public culture; governance; mission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Norm and Tourists' Civilization  
Tourism Behavioral Intention: An Extend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Model** (96)

Qiu Hongliang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 Hangzhou 311231)*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evelop an extend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model which includes moral norm and the components of TPB to predict tourists' civilization tourism behavioral intention. In order to test the extended model, a total of 1392 valid domestic tourists collected in Hangzhou as data input.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indicate that: ① Subjective norm is an antecedent of tourists' civilization tourism behavioral intention while totally mediating the effect of moral norm or 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 ② 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 significantly and directly affects tourists' civilization tourism behavioral intention; ③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significantly and directly affect tourists' civilization tourism behavioral intention while partially mediating the effect of 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 Moral norm is an antecedent of tourists' civilization tourism behavioral intention while partially mediating the effect of 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 ④ Moral norm is the most indispensable factor in the extended model.

**Key words:** civilization tourism behavioral inten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moral norm; extended model; tourists

**Operation Logic of Property Fee Collection in Urban Community  
—Taking A Community Formed by Housing Reform In Nanjing As An Example** (104)

Qu Qunping

*(The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Taking Xi Yuan Community of Nan Jing as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e collection strategies of property companies and their effects on property order and community's politics. During the daily fee collection, the property company usually acts between the space of "withdrawal" and "being fired", which consist of action framework and fee collection's logic. Under this action framework and interest logic, the company may, according to the owner of different types, take different strategies such as pressing for payment by law, operating by rules, luring by profit and treating with respect. This action selection is a dual process aiming at contract and strategies actions of owners, and it also builds the ductile boundary of conflict neighborhood politics and property order. How to keep the ductile boundary of property order stability and alert the property company to operate differently in political work is a property issue which should be reminded.

**Key words:** property fee collection; property company; differentiation owner; property order; different politics

**Theoretical Issues in Research on Leisure Studies** (110)

Pang Xuequ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sia Pacific Centre for the Education and Study of Leis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China in both leisur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However, many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challenges need to be addressed and explored for building a system of comparatively accurate theoretical views and clear self-con-